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之三

德国(西德)蒙古学研究近况

[日]田中克彦

潘世宪 译

供内部参考。如需
引用，请逐从原文。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编印

1979.7 呼和浩特

德国（西德）蒙古学研究近况

田中克彦 （东京外语大）

我得到汉堡基金会的奖学金，在德国（西德）留学了两年，就视野所及，归国后回顾了一下该国的蒙古学研究及见闻，虽然留下的印象不算多，但有不能已于言者，因此，笔者不顾我的学识浅薄，不管研究主体的意识面怎样，更不管受到如何的外国限制，行动半径的狭隘等等，还是想写出来供学者们参考。在狭义上讲，我的专业是蒙古学研究，但还是在更狭的意义的题目范围内赴德留学的，在这个题目方面，接受了指导教授的指导，还是有两次与各地的研究者及研究机关（单位）广泛地接触过。另一方面，关于斯拉夫学，一般语言学，人种学、德国人种学等方面也得到了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机会，我发现了与我国（指日本——译者注，下同）大不相同的学风，引起了我的深思。特别是德国民俗学（在波恩方面，是由纂著《德国人种学概论》的M曾德教授任教）与民族学、其研究对象是有重点的，其姿态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点具有深刻的意义。以上只是波恩大学的情况。

我盼望着与各国蒙古学学者见面的机会，虽然机会难得，可是还是得到了出席四次国际会议的机会。第一次是莫斯科第七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认识了蒙古的青年学者巴达哈坦。并通过他的著作，知道了关于游牧形态及社会组织进行详细的调查问题，（例如：他的《库苏古尔驯鹿饲养民的经济生活概况》乌兰巴托〔出版〕1962，〔预定〕将在《北亚民族学论集》第4集上介绍）。由当地人作的这类调查，其价值之高是不难想象的。话题之外，我还想提一下，在这个学会上，我特别关心并且参加了的《民间传说》分会。出席者多数是苏联的阿尔泰各族（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儿、土瓦、阿尔泰、维吾尔、卡尔梅克人）以及巴尔干的斯拉夫各民族出身的人。与这个所谓学会联系起来，可以想象出是多么热烈的气氛。在莫斯科这地方举行这样的学会，就是在这个分会里，毫无遗憾地表现出了其真面目。除我以外，日本人没有出席该分会的。在我国的学会中没有很好传达这个分会的表现。归国后，我觉得是一个遗憾，看看参加者的名单，发言的人都用大俄罗斯语。讨论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这里我想说，将来在我国举行第八届大会时，包括这样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虽然学问有限的素朴的参加者，在语言问题上也必须很下一番功夫。其次，我还出席了第七届（1964）、第八届（1965）阿尔泰学会（PIAC），其对象是（预定）参加1965年在维茵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的所谓“蒙古历史编纂”分会的人，其所以要和PIAC同时召开，就是因为过去没有阿尔泰型的学者参加过。在外国人中，也只有拉铁摩尔是唯一的蒙古学者。但是这里有乌兰巴托的历史学者了，S·纳萨道尔吉，S·毕拉两人参加了。其他方面，堪称学者的很少。但

是，现代蒙古史学挤进这样大型的国际学会中占居一席，这是应该注意的。

上面是过长的前言，以下略述德国方面，先谈背景材料，言归本题。表示出德国蒙古学的关心与方向的，就我所知，就是波恩大学。

当我到达（西德）时，波恩大学的蒙古学是放在以中国学、印度学为主的东方语言研究班（习明纳尔）之中的。日本学也挤于其中占一小小位置。1964年，以海西施（Heissig）教授担任正教授，从这个大杂院分离出来组成独立的“中亚语言文化学研究室”（Seminar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后，不仅是在德国，就是在西欧，也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最充实的蒙古学中心了。上面所说的这个研究班的名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研究室的规划课题的方向了。也就是说，就阿尔泰语言、民族系统论的、发生论的角度，将以前的某种程度的科学研究领域建立起来。这方面的关心不能说很薄弱了吧？勿宁说：要就形成历史的各种文化问题都作内在的说明，作为这方面课题的中心。如果，前者的立场，即将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放到阿尔泰学的角度中的立场建立了的话，这便成为突厥学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了。在波恩大学里，这方面是作为伊斯兰学这样做的。因而这不仅是由语言分类系统而是由文化系统来分类的了。再者，作为“中心”，也就是“包括”的意思。这里，当前是以蒙古与西藏为对象的。（考虑到中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西藏问题。这种看法，自费舍：《世界史—中亚编》法兰克福，1966，起便形成了）也可以解释为从中亚佛教文化圈的对伊斯兰文化圈的关系中割下来。在我国成长起来的蒙古学研究者缺乏对这方面的系统论的看法，真是很可怜。同时，再从全面看我国过去对蒙古学文献研究来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参加研究班的人，特别是蒙古语和同样程度或者更高的藏语程度，都是很好的。总之，以蒙古学研究为基本研究领域而组成独立的研究班，在西欧还只有波恩（大学）。在1964年的PIAC上，宣布它升格为“中亚语言、文化学科”，参加的人全体起立鼓掌。这是划时代的事件。以研究室主任教授W.海西施为中心所开展的研究，出版活动，现在可以说是居世界上领先的地位。最近，我亲眼看到了它的活动经过。

从前，与用什么方法研究蒙古学，有关的人们都知道、有用蒙古语书写的文献。但除十三世纪的所谓《元朝秘史》及以后十七世纪的《蒙古源流》、《阿勒坦托卜赤》之外，只不过二、三种而已。符拉基米尔佐夫写《蒙古社会制度史》（有日译本），在利用能弄到手的蒙古（文献）资料时曾提到了叫做拉德洛夫史册的编年史（即《青史》）。以前有这样的文献存在，可以纠正把这个时代叫做“黑暗时代”的波滋德涅耶夫的立场。这记录是有意义的。海西施在柏林时代的老师E.海涅士（E.Hainisch）对[是否]有蒙古语文献存在，也抱悲观态度（也是个悲观论者）。最近读到乾隆木刻本《蒙古源流》的序言，似乎那里面也有这种暗示。海西施具体地打破了这一般观念，为了建立作为研究蒙古学的前提的蒙古语文献学，迈出了向今天地球上所有保存着蒙古语文件的地方实行在库（存书）总调查大进军的第一步。这是笔者的解释。纵然是一张纸片，只要是用蒙古语书写的，就不会没有历史研究上的意义。叫我到哪里去（找寻）都可以去。他说过这样的话。被他这话、这种信念所征服的人确实不少。某一文献中所表现的书类或人物名称等，只要有片爪的记载，他就跑了去了。这种摸蔓找瓜式的探索，范围是很广的。这种行动的最初体现及其以后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教授（海西施）格琴报时代的《北京蒙语喇嘛教木刻版本》《Die Pikinger lamaistischen blokdrucke in mongolische Sprache》，惠斯巴登1954，这是1650年前后到清

未在北京开板的木刻本约二百部的详细研究。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清朝对蒙古的出版政策的全貌，也可以知道余世界各地所保存的木刻本，（那本书）相当于这书中的那一种。

以这一成果为样板，已经着手对整个西欧所存蒙古语文献，作存库调查。德国方面，《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惠斯巴登，1961，便是成果。这是在“德国调查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支持下规划的，全德所保存的东方语言的著作全部“目录化”并出版《德国藏东方手钞本目录索引》（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的一部分。上述《蒙古编》首先完成了。包括柏林、得累斯登、葛廷根、莱比锡、迈因兹玛尔堡、慕尼黑、斯图加特、图宾根等东西两个德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里所保存的855部钞本、木刻本，手抄本、地图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笔者为了验证它的记述的可靠程度，曾到玛尔堡弄到了一本卡尔梅克文钞本，与《目录》的记载完全吻合。于是我佩服其记述的正确无比而慨叹，宽宏度量、胆气豪壮的作者们，其事业的高精确之不可思议性，实在令人敬佩。笔者所没有读到的，还是没有读，这应该声明于此。借此机会，我想说这《目录》是近乎100%的“可靠”（Zuverlässigkeit）。象这样的书，是集合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德国人的蒐集活动的。应该列入蒐集特殊功勋人名单的只能是与德国东方史研究、德国关心蒙古西伯利亚时代里活跃的人们。例如：Johannes Maierig, 1773—1774年参加帕拉斯西伯利亚旅行，其蒐集品在他死后由芬雅施送交葛廷根。又芬雅施男爵（Baron von Asch, 1807年度于彼得堡）1778—1790年间曾蒐集到蒙古语、卡尔梅克语钞本三十三部。这成了葛廷根的《雅施藏书》可参看当时漂流于彼得堡的大黑屋光太夫寄回故国的书简等。（这《雅施藏书》中所包括的书，参看龟井高孝所著《大黑屋光太夫》吉川弘文馆，昭39〔1964〕，172页以下）。

H.A.茨维克（Zwick）在1823年以前就住在卡尔梅克草原上。他所收集的70部卡尔梅克语钞本，现存得累斯登。此外，如：施林、康斯塔德（Schilling v. Canstadt）或写了《论德国》一书的施塔厄尔夫人（Madame von Staël）的第一丈夫施塔厄尔。荷尔斯坦（Voin Staël Holstein）那种兴趣很浓的人物，也有些蒐集品。列举人名，只能到此为止。

应该注意的是海西施——就钞本的由来、蒐集者姓名都结合注入，越出了单纯书志、题解的范围，同时还描绘出了研究史的一个侧面。

他曾说过：“我寻找蒙古语钞本而迈开步子时，总是除蒙古以外，到各地去发掘，总不把欧洲除外。”（《一个民族、找寻自己的历史》Ein Volk sucht seine Geschichte，杜色尔多夫—维也纳1964，142页）。调查的手，事实上伸向了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鲁汶（比利时）、安托瓦堡、贝伦等地。其结果都已发表，有些已经当作蒙古语文献史上必须的东西而被使用上了，尤其是哥本哈根方面，数达565部。在数目上虽不及德国的855部，但其质量之高，实无以类比。蒙古语文献、文学方面这种空前绝后的高密度，叹为观止。其中，例如：锡喀格图·固实·达尔玛（Siregetu guosi dhalma）的《阿勒坦明干格格速图毕琪格》（Altan mingran gegesüü bičig《金轮千辐》，1739）。哥本哈根的（钞本）是唯一无二的了。其照象复制（本）给了乌兰巴托的蒙古人研究者很大裨益。这种蒐集（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内蒙古日本官宪的监视之下K·格凌贝克还是干了许多蒐集活动，成了丹麦的巨大的财富。海西施教授与伦敦的查尔斯鲍登（Charles Bawben）已经共同完成了其《目录》的编纂工作，笔者在波恩时，印刷的《目录》样本已经陈列在书架上了，但

还未发行。其整理资料的助手是 K·萨格斯特 尔 (K·Sagaster) 这里也不能不提到他。

最使笔者感到羡慕的是为此目的而离开波恩的研究室去制作那些不仅德国的、而是全欧的钞本的胶片。其中一部分是扩大复制,供一般研究室利用的,海西施教授用蒙古语书写的一切资料,都被放在这研究室里供阅览,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实行这样巨大的有组织的计划哩!

蒙古人手绘的地图能够保存下来,我已经看到过了。其数目达 180 幅以上。这数字比之乌兰巴托的目录上的 360 幅,绝不算少了。这些古地图上集合了约 13000 个地名。已经由该研究室的蒙古人讲师马嘎德布琳·哈尔托特 (Magadbürin Xaltod) 整理、出版了《蒙古地名索引》。(《Verzeichnis der mongolischen Ortsnamen, 1966.》) 研究者如果读编年史时出现不知道的地名,查这《索引》,的确可以得到很大帮助。

如上所述,整理资料的基本工作,与此并行,将来进而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将来的)研究工作,必定不会落空的。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都是些未必有很高的可靠性的模糊的观察和记述。作为一个民族学学者克服必须满足的弱点,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波登曾就哥本哈根钞本进行 ScaPulimancy 补考。(《中亚杂志》卷四,1958)。海西施曾由林登·穆色乌木钞本肯定了护符的制造法。尤其是海西施所集录的有关民间信仰的文件 (Heissig,《Mongolische volksreligiöse und folkloristische Texte aus europäischen Bibliotheken》惠斯巴登,1966),对于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者来说是莫大的成果。这就可以说明上述的目录化(工作)具有多大的意义了。

海西施教授探索文献之手,目下已伸向江上波夫带回来的 200 点(种)以上鄂伦苏木文件了,可注意的是,这些是蒙古文献史上长期被埋没的东西。我国所保存的这些片断(的东西),已由服部四郎解读出来了。但是,关于这些(文件)在蒙古文化史上所应持有的意义,几乎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其中多数是与 1305 年翻译的 Bodhicaryāratāra 文字是一致的。这事经过文字的复原工作,已经弄明白了。其研究的一部分,刊载在《内蒙古鄂伦苏木出土的石印与手钞残编》(Die mongolische stein in schript und Manuskript, fragmente aus Olon sūme in der Inneren Mongolei, 葛廷根,1966)上阐明了,预定即将刊行。

最后,想谈一下我国蒙古学学者认为不能包括在科学领域里的部分(分野)。过去,蒙古学研究就完全没有以个人思想为单位的。更就某种文献或著作来说,也没有形成说是属于文学史或思想史那样不同领域的说法。这种看法(角度)是因为蒙古学研究是从蒙古人本身开始所产生。但是,我国从事现代蒙古问题研究的倾向,学界中没有很强的积极姿态。过去十年间,蒙古人不断进行研究(我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准备。只要看一下拉铁摩尔的一系列著作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国对于蒙古人取得的珍贵的研究成果,不闻不看,而拉铁摩尔的藏书,就有利用波恩研究室的《目录》胶卷的成就。

海西施教授曾谈到他的次一目标是纂写蒙古文学史一书,不仅是有这抱负,而且已经看到他正执笔进行中的文稿了。这究竟要采用什么形式,只要看一下《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Bd. 5, Altaistik)。莱登-科恩,1964 中心《蒙古文学》(Mongolische Literatur)就可以想得出来了。看一看这些,可以知道对最近十年来蒙古人的研究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的了。同样,我们只是深埋在欠缺知识的深阱中。写出《内蒙古蒙古文学史及民俗学研究》(Innere Mongolische arbeiten zur mongoli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und folklorforschung) (德国东方学会杂志) 其中载有例如帕伽(Pajai) 那样的吟游诗人在动荡的历史中是怎样生活的? 从(他) 可以知道迄今还可用传统形式创作即兴故事。

以上所说, 只限于波恩(一地) 的情形。例如, 曾一度列席其演讲的格哈德·杜费尔(Gerhard Doerfer) 迄今为止, 主要只知道他的语言研究家的一个侧面, 但是他的关于《论突厥各族文学表现的共同性》的演讲, 显示了他知识的广泛性。

不以文学研究为前提, 语言学(的研究) 道路就会很窄狭, 蒙古学研究现今已经开拓出了语言学的领域。笔者这是以(自己的) 感想来结束今天的报告的。以上是以 1966 年 10 月 29 日在研究座谈会上的报告为骨干, 省略了当时一些琐谈(叙述), 整理出来的。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潘世宪译自《民族学研究》31 卷 4 号。1967 年 3 月)

〔书评〕海西施：《欧洲各图书馆 所藏蒙语民间宗教民俗学目录》

德国·惠斯巴登·1966

这本书是作为汇集德国各地所保存的东方各种语言的手抄本、木刻本编成目录这一壮大事的第一炮而刊行的, 是该编著者所著《蒙古语手抄本、木刻本、地图册》(《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惠斯巴登, 1961.) 的续篇而刊行的。本书所包括的 77 部的内容并不仅是全德国的, 也包括: 多勒斯登 1、柏林 1、丢宾根 6、葛廷根 1、玛尔布鲁克 9、灵敦博物馆(谢图德卡尔特) 1, 其余大部分是哥本哈根的。此外还包括: 安特瓦普, 鲁班(比利时)、斯德哥尔摩、奥斯陆的。这书里所载蒙古语手抄本的性质如何, 全欧各地如何分布保存的, 这是由各国与蒙古的接触如何而定的。这点很有意义。长达 53 页的序言(Einleitung) 是就蒙古语文献中可以作为民俗学资料而利用的书本的题解。作者在作为一位文献学学者方面, 这真是一篇辉煌的著作。《欧洲所藏民间宗教祈祷文》、《迄今所知蒙古人的非喇嘛教宗教资料》里, 指明约翰内斯·耶里希(歿于 1795 年) 在 1794 年就已搜集到本书所载的一个抄本, 这一事实在研究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接着在《〈民间宗教文学〉之各种特点》一书(的题解) 中指明喇嘛教的祈祷文与萨蛮教的祈祷文之间已有深度的融合, 要划一条区分线是困难的。已不能说(什么) 是萨蛮的, 只能用“民间宗教的”来指萨蛮教的了。因此, 这类属于萨蛮教的作品表现出公式化表现, 章句的反复及其他各种特征等显著的一致性。比较这种定式的各版本的确实方法, 全部书里是贯彻始终的。例如, 关于《火之祭祀》所进行的研究祭祀用舞蹈台子, 是今后进行这类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的范例。(书评作者在波恩时, 有机会曾看到作者与棹上展开的大幅表格搏斗的姿态, 这就是所结出

的果实。一原注)

继则区分为以下十大项目:

- (1) Mongke ingri 之祭祀,
- (2) 火之祭祀,
- (3) 白老人 (čayan ebügen) 之祭祀,
- (4) 格色尔汗之祭祀,
- (5) 成吉思汗之祭祀,
- (6) 山岳信仰,
- (7) 骑马者的精灵信仰, -
- (8) 萨蛮编年史,
- (9) 结婚仪式习惯,
- (10) 一年中的大事 (节日)。

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每种都有询根问底的记述。第(8)名为:《Ongyot qara sakiyus-un teuke sudurl bičig orosiba》的珍贵的萨蛮教记录,应该大书特书。

这本书里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这里,我们不仅知道欧洲(所存)的书,也会想到与林琴(参考《林琴博士的蒙古传说研究》载《民族学研究》27卷3号)、田清波(Mostart)等人所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是把已经刊行的书籍、文章都全部知道了。

再者,(本书)对照像帕拉斯(pallas)和帕格曼(Bergmann)那些18、19世纪的旅行家在当地的见闻也是很周到(全面)的。这种以不同时代的、不同性质的资料与某一种资料对比判断的方法。例如:肯定了现代蒙古文学作品中相对应的记述。拿来说明就是这些古钞本里的相同的祈祷文的再现。这样,其资料的确实性就更高了。作者对于古今典籍是具有高度精确知识的。本书所使用的这种手法,显示了将过去的蒙古学研究大大推进一步的方法和力量,蒙古民俗学从此将步入更高、更坚实的立脚点上,大步前进。

东京外国语大学:田中克彦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潘世宪译自《民族学研究》31卷4号,1967、3)